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 第二十辑/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ISBN 7-100-01930-3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研究-丛书 IV. HO-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546 号

YǔYÁN XUÉ LÚNCÓNG

语 言 学 论 丛

(第 二 十 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930-3/H·562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7 千

印数 1 000 册

印张 9 1/4

定价: 13.60 元

目 录

继承传统, 不断前进

- 纪念《语言学论丛》出版二十辑 林 焘 (4)
- “语义学比较法”简说 邢公畹 (7)
- 古汉语词汇和汉民族文化 蒋绍愚 (16)
- 阴阳五行观念和汉语词汇 向 熹 (35)
- 《朱子语类》和休宁话的完成态“著”字 梅祖麟 (69)
- 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 江蓝生 (99)
- 试说近代汉语中的“~那? 作摩?” 曹广顺 (108)

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

- 韵尾 平山久雄 (117)
- 《字汇》与明代吴方音 古屋 昭弘 (139)

汉语方言接触的几个类型

——并论“国语”声调及闽语唇音声母演变的

- 两个问题 丁邦新 (149)
- 杭州方言上声字中声母 *v*、*z* 的音变 王福堂 (166)
- 语音的有声性和区别性 沈 炯 (175)
- 现代汉语 ABB 词及其历史演变 徐 浩 (207)
- 带方位处所宾语的动词及相关句式 沈 阳 (243)

- 《语言学论丛》第 1—20 辑篇目分类索引 (280)

CONTENTS

Inherit tradition make constant progres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issue of the 20th

volume of *Yuyanxue Luncong* Lin Tao (4)

A brief survey of semantic comparative method

..... Xing Gong-wan (7)

Lexicon of ancient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 Jiang Shao-yu (16)

The conception of *Yin v. Yang* and *Five Elements*

reflected in Chinese lexicology Xiang Xi (35)

Perfective *zhe* (著) in *Zhuzi yulei* (朱子语类) and

Xiuning (休宁) dialect Tsu-lin Mei (69)

Deductive method in textual research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words Jiang Lan-sheng (99)

Remarks on *~na? zuomo?* (～那? 作摩?) in early

Chinese Cao Guang-shun (108)

Labialized glottal endings and palatal endings in Sui

and Tang phonology Hirayama Hisao (117)

Zi Hui (字汇) and the *Wu* dialect of Ming Dynasty

..... Furuya Akihiro (139)

Types of dialect conta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ogether with two problems in the evolution of

Mandarin tones and Min labial initials ... Ting Pang-sin (149)

Voiced initials v and z in rising tone characters of

Hangzhou dialect Wang Fu-tang (166)

Perceptibility and distinctiveness of speech sound

..... Shen Jiong (175)

Words of ABB pattern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eir

historic evolution Xu Hao (207)

Verbs with objects of location and their related sentence

patterns Shen Yang (243)

General index of *Yuyanxue Luncong* from vol. 1 to

vol. 20 (280)

继承传统, 不断前进

——纪念《语言学论丛》出版二十辑

林 焘

1957年,《语言学论丛》出版了第一辑,在“前言”里有这样几句话:“这本《语言学论丛》(第一辑)只是我们工作的开端,以后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希望还能够继续出版下去。”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论丛》能够断断续续地坚持出版,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二十辑,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也可以说是始料所不及的。一种非期刊性的学术论文集,能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在国内也是很少见的。

回想1956年的秋天,北大中文系的汉语专业刚刚成立两年,王力先生和高名凯先生分别担任汉语教研室和语言学教研室主任,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已经逐渐成长起来,那时正在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些青年人的热情很高,但是当时语言学方面的刊物不多,他们的研究成果很难有发表的机会。一天,王力先生在教研室偶而和我谈到这种情况,提出是否可以办一个不定期的学术刊物,这样既可以对青年人起到鼓励作用,又可以活跃语言学界的学术空气。我们立刻从语言学教研室请来高名凯先生一起商量,王先生这种提拔后进的想法自然得到高先生的赞同。经过短期的酝酿,很快就组成了编辑委员会,由当时两个教研室的教授和副教授担任编委,其中有:王力、朱德熙、岑麒祥、周达甫、周祖谟、林焘、高名凯、袁家骅、杨伯峻、魏建功(以姓氏笔划为序),一共十人。在第

一次编委会上,确定了《语言学论丛》的名称,决定以不定期的学术性论文集的性质出版,下设编辑部处理日常组稿编辑等工作。最早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我和两位当时的青年教师石安石和王福堂,此外,还安排两位当时的研究生向熹和李思敬参加部分编辑工作。魏建功先生为《论丛》题写了书名,王力先生为《论丛》联系到出版社。第一辑的组稿编辑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共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年青人都愿意有发表自己文章的园地,这一辑发表的十二篇文章里有八篇是当时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写的。

当年创办《语言学论丛》的宗旨是非常清楚的,主要是为北大汉语专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辟一个发表自己文章的园地,这个宗旨一直延续到现在。历年以来,北大汉语专业绝大多数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都曾经在《论丛》上发表过文章,汉语专业本科生中一些比较优秀的学年论文也曾在《论丛》上发表。当年的这些青年学者有不少人今天已经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的骨干力量,他们当年在《论丛》上发表的文章,有的在今天看起来也许还不是那么成熟,但是正可以从中看出他们的成长过程。汉语专业历年的中老年教师都热情支持《论丛》,踊跃为《论丛》写文章,王力先生生前先后共在《论丛》上发表了八篇文章,充分体现出他对《论丛》的关怀和支持。此外,曾在北大讲过学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进修过的进修教师也都有文章在《论丛》上发表。《语言学论丛》可以说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三十多年来语言学在北大的发展情况和趋向。

《论丛》第一辑是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不久新知识出版社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改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60年出版到第四辑以后,大陆上掀起了大跃进和大批判的高潮,像《论丛》这样的纯学术性论文集,自然非常不合时宜,只好停刊。当时的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另编辑成《语言学研究与批判》论文集,一共出版了两辑,1963年,运动高潮过去了,《语言学研究与批判》和

《语言学论丛》合并,改组了《论丛》编委会,编成了《论丛》第五辑,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五辑出版后,在第六辑已经编好准备付印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这一停就是十七年,直到1980年才得以重整旗鼓,重新编辑第六辑,商务印书馆也愿意在十七年后继续承担《论丛》的出版任务。近几年学术性书籍销路日减,商务印书馆不计较经济效益,仍旧愿意继续承担出版任务,使《论丛》能够不断出版,直到目前的第二十辑。商务印书馆长期以来对《论丛》如此支持,是应该特别表示感谢的。

回顾《论丛》几十年来的编辑出版过程,确实有许多感慨。《论丛》最早的十位编辑委员,其中的九位今天都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这些已故师友的十分宝贵的治学经验积累成的学风并没有随着他们消失。《论丛》已经发表的二百多篇文章,基本上都能够保持这一贯的学风,没有为各时期的非学术性因素所左右,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自然也就不得不因此两次被迫停刊。一种学风的形成,往往需要几代学人治学经验的积累,是得来不易的,其中得失,最好留给后人去评说,我们今天所应该做的,是珍惜这种得来不易的学风并加以发扬。我相信,现在的《论丛》编委会是能够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的,《论丛》今后一定会办得更好,不断前进,为推动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语义学比较法”简说

邢公畹

语义学比较法是以音韵学、训诂学为主要工具的研究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先求出汉语(例如以广州方言为代表的)一个字(当然是属于基本语词的)的上古音形式,然后在台语(例如以曼谷话为代表的泰语及原始台语形式)以及藏缅语(例如藏文和缅文所保存的形式)里查找有没有可以和它相对应的字;如果有,我们再看汉语的这个字有哪些和它同音不同义的字,然后查找这些同音不同义的字在台语以及藏缅语里是不是也都能对应;如果也能对应,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组多层对应的字群。在这个字群里,汉、台以及藏缅的这些能对应的字之间的关系是发生学关系,不是借贷关系。

现在我们约定几个符号,把对应的公式写出来,就可以把刚才的话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用 C 代表“汉语一个词形”,用 T 代表“泰语一个词形”,用 M 代表“汉、泰语的词义”,用小写的 s 代表“细微差别”,用:号代表“两个单词对应关系”,用括号|代表“一组对应关系”,就可以把最基本的 A、B 两个公式写出来:

$$\begin{array}{ll} \text{公式 A:} \begin{cases} \text{CM}_1 : \text{TM}_1 \\ \text{CM}_2 : \text{TM}_2 \end{cases} & \text{公式 B:} \begin{cases} \text{CM}_1 : \text{TM}_1 \\ \text{CsM}_2 : \text{TsM}_2 \end{cases} \end{array}$$

对应关系还可以多于两层,就是说还可以出现 M_3 、 M_4 等等。公式还可以扩展,如用 Z 代表藏文,加上: ZM_1 等等。

现在我给这两个公式各举一些例子。

关于公式 A, 我们先举汉语的“雀”和它的同音词“爵”为例。

甲骨文有“雀”字。《说文·隹部》：“雀，依人小鸟也。从小隹。读与‘爵’同。”段《注》：“今俗云‘麻雀’者是也。其色褐，其鸣节节足足。礼器象之曰爵。爵与雀同音。后人因书小鸟之字为爵矣。”甲骨文“雀”字的写法也从小、隹。在卜辞为人名与方国名。甲骨金文都有“爵”字，象精致的高脚酒器之形，和出土的商代爵相似。标准的陶爵，最早见于河南偃师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中，器身划纹，作羽毛状。河南龙山文化中已见到爵形器（见邢公畹 1984）。《说文·鬯部》：“爵，礼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雀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依段《注》改）。和甲骨文相比，秦篆从“鬯”与“又”，大概是后人增加的笔画。泰语 $t\phi\text{ɔ:k}^{71} < * t\phi$ (CT. 页 164) 有两个义项：1) 麻雀，又称 $kra^p\text{t}\phi\text{ɔ:k}^{71}$ ；2) “祭祀用的高脚酒杯” (chalice, 见 McFarland 页 234)。西双版纳傣语 $ts\phi k^{71}$ 和龙州壮语 $t\phi\text{ɔ:k}^{71}$ 都有“麻雀”、“酒杯”两义。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 〔例 1〕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ts\phi\text{ɔ:k}^{71} < * tsjakw, \text{“雀”} : \text{泰 } t\phi\text{ɔ:k}^{71} < * t\phi \text{“麻雀”} \\ \text{广州 } ts\phi\text{ɔ:k}^{71} < * tsjakw, \text{“爵”} : \text{泰 } t\phi\text{ɔ:k}^{71} < * t\phi \text{“高脚酒杯”} \end{array} \right.$

汉语上古音 * ts- 声母可以和泰语 * tφ- 对应；汉语上古音药部字可以和泰语 -ɔ:k 韵字对应，；如：

广州 $ts\phi\text{ɔ:k}^{71} < * tjakw, \text{“酌”} : \text{泰 } th\phi\text{ɔ:k}^{71} < * th^{-1} \text{“倒(酒, 米)”}$

广州 $po:k^{71} < * prakw, \text{“曝”} : \text{泰 } no:k^8 < * nllr \text{“外面”}$

“麻雀”、“酒杯”两义相距很远，而汉台两语完全对应，决不是巧合；汉语的 $ts\phi\text{ɔ:k}^{71}$ 和泰语的 $t\phi\text{ɔ:k}^{71}$ 的关系是发生学关系，不是借词关系。如果说泰语当“高脚酒杯”讲的这个词是汉语借词，那么为什么连“雀”字也借过去？而且要研究台语为什么当“麻雀”讲的词又有“酒杯”之义，只有从汉语的古代文献中才能找到解释？像这样寻找语词之间发生学关系的方法，不是根据语法形态上的对应，而是根据语义上的对应，所以叫做“语义学比较法”。

我们再举汉语“耆”为例。李方桂先生在 Sino-Tai 一文中用泰语 $ke^5 < *k$ -(CT. 页 187) 和汉语“耆”(广州 $khe^2 < *gji < *gjid$) 对应。其实 ke^5 的两个义项都可以和汉语“耆”对应：1) 老，如 $kho^2 ke^5$ “老人”。《说文·老部》：“耆，老也。从老省，旨声。”渠脂切；2) 高强，如 $ke^5 kla^3$ “强壮”。《左传·昭二十三年》(《十三经》页 2103)：“不孺不耆”，杜预《注》：“耆，强也。”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对应式：

- [例 2]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khe^2 < *gjid \text{ “耆”} : \text{泰 } ke^5 < *k \text{ “老”} \\ \text{广州 } khe^2 < *gjid \text{ “耆”} : \text{泰 } ke^5 < *k \text{ “强壮”} \end{array} \right.$

C 是 khe^2 , T 是 ke^5 , 音韵形式上可以对应。 M_1 是“老”， M_2 是“强”， $CM_1 : TM_1$ 是单层对应，加上 $CM_2 : TM_2$ 就成为多层对应。关于 M_1 ，藏文 $bgr\text{es pa}$ “老人”(《格西》页 153) 可以比较。“(人)老”，泽库藏语说作 rgi (《藏缅》857 号)，而阿里藏语多说作 $ke:l$, $ge:l$ (瞿，谭页 364)，与泰语音近。

我们再举汉语“沉”为例。《广韵·侵韵》：“沉，没也。直深切(ɕɕjəm)。”《说文·水部》：“沈…一曰浊黚也。”直深切。《广韵·感韵》：“黚，滓垢也；黑也。都感切(ɕtəm)。”是则“沉”字有“没入”和“黑”两义。泰语 $dam^1 < *ɖl/r$ -(CT. 页 129) 也有“沉”、“黑”两义。如 $dam^1 nam^4$ “潜水”； $pha^1 dam^1$ “黑布”。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 [例 3]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tsham^2 < *ɕɕjəm \text{ “浊黚”} : \text{泰 } dam^1 < *ɖl/r \text{ “黑”} \\ \text{广州 } tsham^2 < *ɕɕjəm \text{ “沉”} : \text{泰 } dam^1 < *ɖl/r \text{ “沉没”} \end{array} \right.$

藏文 dim “沉”，拉萨说作 $thim$ ；但藏文“黑”为 $nag po$ ，不与“沉”同音。

汉语上古音侵部字可以和泰语-am 韵字对应，如：

广州 $ta:m^3 < *ɕtəm$ “扰”：泰 $tam^1 < *t$ “春(米)”

广州 $kam^1 < *ɕjəm$ “金”：泰 $kham^2 < *ɣ$ “金子”

广州 am⁵ < *ʔəm⁵ “暗”: 泰 kham⁶ < *ɣ- “夜晚”

广州 tsam³ < *ʔrjəm³ “投”: 泰 tam⁵ < *t- “织(布)”

语义上的对应有时可以多至五层,如李先生在 Sino-Tai 一文中用泰语 ke³ < *k- (CT. 页 187) 和汉语“解”(广州 kai³ < *kau < *k³rig) 对应,其实 ke³ 有五个义项都与汉语对应:1) 解开,如 ke³-təhwak⁸ “解开绳结”;《礼记·曲礼》(《十三经》页 1240): “解屦不敢当阶”;2) 脱(衣),如 ke³pha¹ “脱衣”;《战国策·齐策六》: “太子乃解衣免冠,逃太史之家为溉园”;3) 消除,如 ke³kra²hai¹nam⁴ “解渴”;杨雄《太玄赋》: “饮玉醴以解渴”。泰语 ke³ 的“修改”一义,实际从“消除错误”义来,如 ke³kham²phit⁷ “改错字”;4) 解释,如 ke³fan¹ “解梦”;《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吴王即遣子胥解梦”;5) 解决,如 ke³tok⁷ “解决”;王充《论衡·案书》: “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 …?”(甲骨文已有“解”字,义为“剖取牛的角”)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对应式:

- [例 4] { 广州 kai³ < *k³rig “解”: 泰 ke³ < *k- “解开”
广州 kai³ < *k³rig “解”: 泰 ke³ < *k- “脱(衣)”
广州 kai³ < *k³rig “解”: 泰 ke³ < *k- “消除”
广州 kai³ < *k³rig “解”: 泰 ke³ < *k- “解释”
广州 kai³ < *k³rig “解”: 泰 ke³ < *k- “解决”

上古汉语支部字与泰语-e 韵字可以对应。如:

广州 phei² < *bjig “埤(增多)”: 泰 phe⁴ < *b- “赢”

广州 tshi⁵ < *tshjig “束(策)”: 泰 se³ < *s- “鞭子”

关于公式 B,我们先举汉语“首”、“撻”为例。泰语 klau³ < *kl- (CT. 页 221) 有两个可以和汉语对应的义项:1) 头,2) 挽、束(头发),如 klau³phom¹ “挽髻”。甲骨文有“首”字,也作“𠂔”。朱骏声(《定声》页 270) 认为“𠂔”字从“首”声,也写作“逯”(渠追切),则“首”字音变程式当为:“首”广州 sau³ < *əjəu < *skhjəgw. “头”,

藏文 mgo, 拉萨说作 ko¹³ (《藏缅》232 号), 毛南 ko³, 仡佬 kvo³, 侗 ka:u³, 壮 kjau³, 都可以比较。现代汉语称头发挽成的结叫 tɕiou¹, 一般写作“髻”。但“髻”的写法无根据。tɕiou¹ 字义为束发纠缭如瓜瓠, 则当写作“髻”。《广雅·释詁三》:“髻, 束也。”这个字音古肴切, 又音“留”, 字从“蓼”声, 则其音变程式当为:“髻”广州 ka:u¹ < ɕkau < *kləgw。这样, 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 {例 5}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sau}^3 < *s\text{khjəgw} \text{“首”}; \text{泰 klau}^3 < *kl \text{“头”} \\ \text{广州 ka:u}^1 < *kləgw \text{“髻”}; \text{泰 klau}^3 < *kl \text{“挽发”} \end{array} \right.$

上古汉语幽部字可以和泰语-au 韵字对应, 如:

广州 sau³ < *səgw “搜”; 泰 sau⁷ < *s- “寻找”

广州 lou² < *ləgw “醪”; 泰 lau³ < *hl- “酒”

广州 lou² < *ləgw “牢”; 泰 lau⁴ < *l- “(猪, 鸡)圈”

上举“醪”、“牢”例实际也是一组合于公式 B 的对应式。我们再举汉语“七”、“扌”为例。泰语 tɕet⁷ < *tɕ- (CT. 页 164) 义为“七”, 汉语“七”的音变程式为:“七”广州 tshat⁷ < tshjɛt⁷ < *tshjit⁷, 有人只就表面的音韵形式就判断泰语“七”是汉语借词, 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说法。甲骨文有“七”字, 丁山认为“七”是“切”字初文, 认为甲骨文“七”字的写法是切物为二, 自中切断之象。“切”字从“七”得声, 《说文·刀部》:“切, 剉也。从刀七声”。千结切 (tshiet⁷ < *tshit⁷), 也写作“扌”。《广雅·释詁三》:“扌, 摩也。”《疏证》(页 78):“《集韵》引《字林》云:‘扌, 摩也。’《魏策》云:‘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齿’, 切与扌通”。可巧的是泰语就有个相对应的 tɕhet⁸ < *dɕ- (CT. 页 168), 义为“擦”, 如 tɕhet⁸mo³“擦锅”, tɕhet⁸nam⁴“把水擦干”。这样, 我们就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 {例 6}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tshat}^7 < *tshjit, \text{“七”}; \text{泰 tɕet}^7 < *tɕ- \text{“七”} \\ \text{广州 tshit}^7 < *tshit, \text{“扌”}; \text{泰 tɕet}^8 < *dɕ- \text{“擦”} \end{array} \right.$

如果泰语“七”是汉语借词, 没有必要把“扌”也借过去。上古

汉语质部字可以和泰语-et, -et 韵字对应, 如:

广州 phat⁷ < * phjit, “匹(野鸭)”: 泰 pet⁷ < * p-“鸭子”

广州 soet⁷ < * swjit, “戌(地支)”: 泰 set⁷ < * s-“戌(地支)”

我们再举汉语“稼”、“家”为例。泰语 kla³ < * kl- (CT. 页 221) “稻秧”, 可以和汉语“稼”(广州 ka⁵ < ka³ < * krag³) 对应。《诗经·甫田》(《十三经》页 475): “曾孙之稼, 如茨如梁。”郑《笺》: “稼, 禾也, 谓有稿者也。”现代汉语仍然称粮食作物为“庄稼”。泰语 khrua² < * gr- “家, 厨”, 李先生在 Sino-Tai 一文中用来和汉语“家”(广州 ka¹ < ka < * krag) 比较。藏文 rwaba “有围墙的房屋”(《格西》页 815) 也可以比较。研究《说文》的人对于“家”字的从宀从豕或从豕省声的说法聚讼纷纭。甲骨文有“家”字, 唐立庵先生说, “家”下从豕省, 豕为豕之古文。卜辞“家”作, 象豕在门中, 以象意声化之例推之, 当读豕声。泰语 khrua² 本义为“灶”, “家庭”全称为 kro:p⁸ khrua², kro:p⁸ 义为“覆盖”, 所以泰语“家庭”义即“宀下有灶”, 此与汉字“宀下悬豕”义近。这样, 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例 7]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ka}^5 < * \text{krag}^3 \text{“稼”}; \text{泰 kla}^3 < * \text{kl-“稻秧”} \\ \text{广州 ka}^1 < * \text{krag}^3 \text{“家”}; \text{泰 khrua}^2 < * \text{gr-“家, 厨”} \end{array} \right.$

下面我们再举三个例子来说明汉语、台语、藏缅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甲骨、金文、秦篆“八”字都写作左右两画, 作分别相背之形, 所以“八”字的本义是“分别”, 但卜辞就已经借音用为数词了。原义为“分别”的“八”, 音转为“别”。汉语上古音“八”、“别”两个字的音韵异同情况和台语、藏文的大体一致。我们看下列对应式:

[例 8]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pat}^7 < * \text{priat}, \text{“八”}; \text{泰 pet}^7 < * \text{p-“八”}; \text{藏 brgjat}^7 \text{“八”} \\ \text{广州 pit}^8 < * \text{bjiat}, \text{“(分)别”}; \text{泰 phlat}^8 < * \text{bl-“分别”}; \text{藏 nbjet}^8 \text{“分别”} \end{array} \right.$

藏文“八”brgjat < * brjat

“八”、“别”两义相差很远, 而从汉、台、藏三种语言中两字对等

的情况看,谁也不是从谁借来的;当然也决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发生学关系的表现。

我们再举汉语“何”、“过”为例。《广雅·释诂二》:“何,问也。”意为疑问词,如《书经·皋陶谟》(《十三经》页138):“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 …’”《广韵·歌韵》:“何,胡歌切”(广州 $ho^2 < {}^c_{\text{ya}} < {}^* \text{gar}$)。泰语 $kua^3 < {}^* \text{kw-}$ “何,如何,为何”,这是一个古词。藏文 $gare$ “什么”(《藏缅》986号),可以比较。《论语·先进》(《十三经》页2499):“过犹不及”。《广韵·过韵》:“过,古卧切”(广州 $kuo^5 < kuə^5 < {}^* \text{kwar}^5$)。泰语 $kua^5 < {}^* \text{kw-}$ (CT. 页236)“过,超过”。藏文 $rgal$ “过(河)”(《藏缅》741号),可以比较下式中 ${}^* \text{g-}$ 与 ${}^* \text{kw-}$ 是公式B中s的表现。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 [例9]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ho^2 < {}^c_{\text{gar}} \text{“何”}; \text{泰 } kua^3 < {}^* \text{kw-} \text{“何”}; \text{藏 } gare \text{“什么”} \\ \text{广州 } kuo^5 < {}^* \text{kwar}^5 \text{“过”}; \text{泰 } kua^5 < {}^* \text{kw-} \text{“过”}; \text{藏 } rgal \text{“过”} \end{array} \right.$

我们再举汉语“九”、“鸠”为例。汉语“九”(广州 $kau^3 < {}^c_{\text{kjəu}} < {}^* \text{kjəgw}$),甲骨、金文写法与秦篆一致。“九”字藏文为 dgu ,拉萨说作 ku^1 (望谟布依说作 ku^3);泰语为 $kau^3 < {}^* \text{k-}$ (CT. 页187)。有人认为台语 kau^3 “九”是汉语借词,缅文 ko^3 “九”,藏文 dgu “九”不是汉语借词,成见之深,令人惊异。《说文·鸟部》:“鸠,鸠属。”段《注》:“鸠之可畜于家者,状全与勃姑同。”汉语“鸠”(广州 $kau^1 < {}^c_{\text{kjəu}} < {}^* \text{kjəgw}$)可以和泰语 $khau^1 < {}^* \text{kh-}$ (CT. 页229)“鸽子”比较,还可以和藏文 $fiaggu$ “鸽子”(《藏缅》140号),缅文 kho^2 “鸽子”比较。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对应式:

[例10]

-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kau^3 < {}^* \text{kjəgw} \text{“九”}; \text{泰 } kau^3 < {}^* \text{k-} \text{“九”}; \text{藏 } dgu \text{“九”}; \text{缅 } ko^3 \text{“九”} \\ \text{广州 } kau^1 < {}^* \text{kjəgw} \text{“鸠”}; \text{泰 } khau^1 < {}^* \text{kh-} \text{“鸽”}; \text{藏 } fiaggu \text{“鸽”}; \text{缅 } kho^2 \text{“鸽”} \end{array} \right.$

研究印欧语所用的历史比较法可以称为“形态学比较法”(morphologically comparative method);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研究汉

藏系诸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我们上面所陈述的查寻多层对应体系的方法可以称为“语义学比较法”(semantically comparative method)。1924年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 Meillet)说得好:“在一种像印欧语这样的语言中,每个词常常至少有两个或三个音节,而它的形式变化又很复杂,所以很便于作完备词源上的证明。……反过来,词很简短的那些语言,通常是单音节的,里面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形式变化,它们的结构就不容许我们作出严格的词源的证明。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一些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一个新的方法不可”(《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译本页33—34)。从前我曾经说:声调体系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跟印欧语里头的语法成分有同等价值(1962《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见《语言论集》页142—172)。今天来看,这句话是错的,因为声调体系只是字的音韵形式的一个环节,不能和语法成分等价。“语义学比较法”应该是我们所要找的新方法。这个方法刚刚提出来,需要论证的地方还很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古代语文学没有语法学,只有名学和训诂学(训诂学即“前语义学”,《尔雅》在古代是一部“名”书),这是由中国古代语言的内部原因决定的;而西洋古代语文学就有语法学,这也是由印欧系语言的内部原因决定的;所以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上,印欧语用的是“形态学比较法”,而汉藏语则只能用“语义学比较法”。

上文说中国古代语文学没有语法学,这是由中国古代语言内部原因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汉语没有语法,古代初步的语法结构分析隐没在训诂学分析中。汉语能发展的是“语义学的语法学”,不是“形态学的语法学”;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总是错误地用语义学的眼光来看梵语语法,如义净在《梵语千字文》的《序》中说:“并是当途要字,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这是不会得到预期的学习效果。“语义学的语法学”和“形态学的语法学”当然有相通的地